三門峽與三峽大壩的政治交易

文丨傅龍山

近日，中國大陸水患嚴重，如何治水又成了熱門話題。然而在中共體制內，治水並非單純的水利問題，而是殘酷的權鬥、政治的角力。本文為讀者揭開水患背後的體制黑幕。



TPG/GETTY IMAGES

2020年8月19日，長江特大 洪水，三峽大壩 實施大規模洩 洪現場。

黃萬里的遺憾與三門峽秘辛

黃萬里（1911年～2001年），是中國水利工程學專家、清華大學教授。

早年畢業於唐山交通大學（現西南交通大學），後獲得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工程博士，是第一個獲得該校工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。

黃萬里曾因反對黃河三門峽水利工程而被劃為右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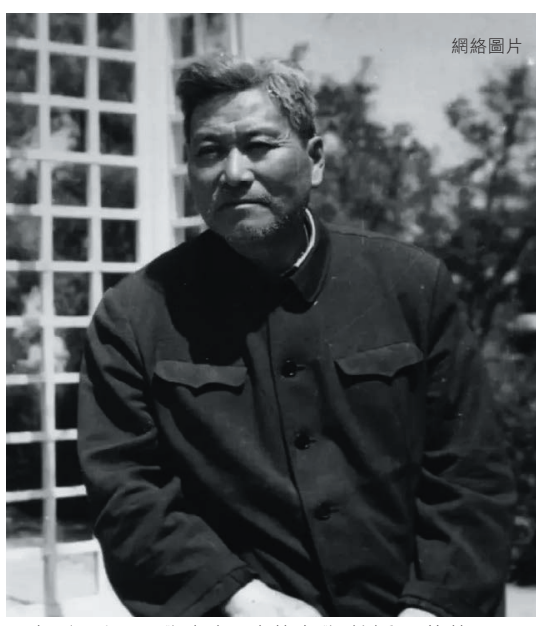
對於1950年代的三門峽大壩工程，黃萬里孤身一人堅決反對，並在會議上跟其他專家進行了7天的辯論。

他的科學論據極為清晰：黃河的癥結在於泥沙，若在三門峽建高壩攔水，泥沙必然在水庫迅速淤積，這將導致上游的渭河流域（包含富庶的關中平原與西安）水位被動抬高，引發毀滅性的水患。

其實早在1946年，國民政府就曾經邀請美國專家對於三門峽建壩發電進行評估，但美國專家勘查研究後認為不宜，報告結論和黃萬里的論點雷同。

三門峽迎合蘇聯的政治氣氛

但當時的中共為了迎合蘇聯專家的設計，決定在三門峽築壩。在一面倒向蘇聯的政治氣氛下，專家建言被視為「反黨叛國」。黃萬里的警告不僅未被採納，反而因此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，遭受長達22年半的殘酷勞改與迫害。



網絡圖片

水利工程 、 學專家、清華大學 教授、 黃萬里。

後來的發展完全印證了他的專業判斷，三門峽大壩建成不久便嚴重淤積，從1960年9月開始蓄水到1962年3月，短短1年半水庫中已淤積泥沙15.3億噸，遠超預期。

潼關高程抬高了4.4米，並在渭河河口形成攔門沙，導致渭河下游兩岸農田被淹沒和浸沒，土地出現鹽鹼化而無法耕作。

三門峽大壩後續迫使中共耗費巨資進行無數次補救，上游數十萬農民也被迫移出居地痛失家園。

2003年10月，中共水利部副部長索麗生表示：「三門峽水庫（發電）……是以犧牲庫區和渭河流域的利益為代價的。渭河變成懸河，主要責任就是三門峽水庫。」

2004年，陝西15位人大及政協委員聯名呼籲停止三門峽水庫蓄水發電，以徹底解決渭河水患。結果數十年後，問題至今依然無解。

三峽工程的警告被封殺

到了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初，當局又重啟三峽大壩計畫。此時的黃萬里雖已獲平反，卻再次面臨中共冷酷無情的碾壓。

黃萬里一生主要反對過兩項水利工程，一是三門峽工程，另外是三峽工程。

官方論證認為長江的泥沙量不如黃河，建壩無虞。但黃萬里敏銳地指出，長江的真正威脅不在懸浮的泥沙，而是江底滾動的「卵石推移質」。

一旦建壩，急流變緩，這些沉重的巨型卵石將會大量淤積在水庫尾端（即重慶一帶）。這不僅會徹底堵塞重慶港，更會讓四川盆地淪為水澤之鄉，上游水患將成為不可逆的常態。

極權體制下的悲戚

黃萬里在體制內的悲戚，不在於他看不見災難，而在於他看見了災難，卻被強行剝奪了發聲的權利。

為了阻止三峽開工，黃萬里曾先後六次上書中共最高領導層，懇求中央給他半小時的時間陳述科學利弊。然而，這些信件在維穩與政治利益的考量下，全部石沉大海。他甚至被禁止參加任何關於三峽工程的決策與論證會議。

中共體制的特性是「下級對上級絕對服從」。在治水問題上，懂得迎合長官意志、粉飾太平的御用專家步步高升；而堅持科學底線、說真話的黃萬里，卻被邊緣化、被噤聲，成為體制內的異類。

黃萬里提出了12項災難性預言

黃萬里曾痛心疾首地警告，若強行建壩，有12項災難將逐一應驗。時至今日，隨著中國長江流域連年爆發嚴重水患與地質災害，這12項預言中的前11項已被廣泛認為已經發生，而最後一項則被視為這座大壩最終的宿命。

黃萬里首先警告大壩將對長江幹流與航運造成直接且不可逆的破壞。

他指出，大壩攔截泥沙後，排出的「清水」將帶有極強的沖刷力，這會導致長江下游幹堤頻繁發生崩岸，直接威脅沿江防洪安全。同時，他預判龐大的工程非但不能如官方宣傳般改善交通，反而會因為船閘效率低落與調度矛盾，嚴重阻礙長江航運。

此外，為建壩而強行搬遷百萬人口，必將衍生極難解決的移民問題，導致長期的貧困與社會動盪。而他最為擔憂的核心問題，則是江底卵石與泥沙的積淤問題。

他強調，大量推移質將淤塞在重慶等水庫尾端，不僅威脅航道，更會抬高水位，埋下災難的種子。

接著，黃萬里預見了巨型水庫對環境與氣候引發的連鎖次生災害。他指出，原本流動的江水變成流速緩慢的靜水湖後，自淨能力大幅下降，將導致庫區及支流水質惡化，頻繁爆發「水華」等污染。

在效益方面，受制於枯水期與防洪調度的牽制，大壩將面臨發電量不足的窘境，根本無法穩定解決全國的缺電問題。

此外，巨大的水體將改變當地微氣候，引發氣候異常，使庫區周邊（如四川盆地）極端天氣交替出現。

此外，水體重力與壓力的改變，極易誘發地質板塊滑動，導致庫區周邊地震頻發與滑坡災害增加。

最後，黃萬里痛心地指出了生態崩潰與區域災難的終局。他警告，水文環境的改變將使得釘螺孳生範圍擴大，導致原本受控的血吸蟲病蔓延。

同時，大壩阻斷了魚類洄游路線，將造成長江生態惡化與生物多樣性的毀滅性打擊。

基於前述的積淤與調度矛盾，他斷言為了保住大壩，汛期必須高水位運行，這將導致江水倒灌，使得上游水患嚴重，讓富庶的四川盆地頻頻淪為澤國。

黃萬里生前最後，也是最沉重的一項預言則是：這座充滿爭議、反科學的政治工程，在帶來無盡的次生災害與面臨潛在的軍事威脅下，最終將被迫炸掉，成為歷史上慘痛的教訓。

「六四」與三峽工程的政治交易

為何一項面臨巨大科學爭議的工程能強行上馬？為何一項面臨巨大科學爭議的工程能強行上馬？其實，這是一場赤裸裸的高層政治交易。

據悉，1989年後，高層為了鞏固權力版圖，將三峽工程作為換取政治支持的重大交易。在這種「政治掛帥」的邏輯下，反對派的聲音被嚴格封殺。

當時的人大表決史無前例地動用了「黨紀」來約束黨員代表，硬生生讓這個充滿爭議的工程強行上馬。

1980年代，對於三峽工程，體制內原存在反對聲音，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也並未輕易放行。然而，1989年的「六四」事件中，趙紫陽因同情學生被罷黜，徹底搬掉了阻礙三峽工程的最大政治絆腳石。

「六四」大屠殺後，踏著學生鮮血上台的江澤民根基未穩，急需與時任總理李鵬結盟，想以此鞏固總書記的地位。

李鵬出身水利系統，三峽工程是其核心利益。專家指出，江澤民鼎力支持三峽上馬，本質上就是換取李鵬政治支持的「大交易」。

《李鵬回憶錄》內容表露：「1989年以後，所有關於三峽工程的重大決策，都是由江澤民同志主持制定的。」

這段文字不僅證實了江澤民的拍板角色，也被外界解讀為李鵬在晚年試圖將三峽的歷史責任「甩鍋」給江澤民。

人禍導致災難

1992年，在江澤民的力推下，三峽議案進入全國人大表決。在高層強行拍板與黨紀約束下，這座「政治工程」最終將中華巨龍攔腰斬斷。

黃萬里提出建言後不得志的一生與三峽工程所引來的一樁樁災變，本質上是同一件事的兩面——當極權體制將維護政權穩定與利益集團分贓置於蒼生性命之上時，人禍必然導致災難。







